

“入世”20 年中国经济安全观的演进逻辑*

孙伊然 何曜 黎兵

内容提要 经济安全即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自主性。经济安全观即一国对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基本认知、理解及判断。加入 WTO 20 年来,中国经济安全观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适应期、调整期、确立期三个阶段。在 2001~2010 年的适应期,中国立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其保障安全的方式更多在于改变自身,而较少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触动或要求。在 2010~2020 年的调整期,中国着眼于对外依存度与脆弱性过高等问题,更多表现出影响外部世界的意愿与信心,旨在解决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与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2020 年之后,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安全观基本形成。中国应对化解外部风险的方式,更为鲜明地呈现出以立足国内为力量源泉、积极主动的特征。这一应变方式不仅仅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而是从战略视角出发,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改善外部环境为指引。总体观之,新时期的经济安全观彰显出强烈的大国意识、应变意识、系统意识,其对本国及世界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渐显现。

关键词 全球化 经济安全观 应变意识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DOI:10.13516/j.cnki.wes.2021.12.006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近 20 年。这一时段在新中国 70 余年历史进程中,自有其独特性及重要意义。它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同时亦为中国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①。如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由于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劲的增长势能,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定位、如何理解本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事关中国与世界经济前景与走向且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围绕相关主题已经展开了深入讨论,且成果颇丰。

本文拟探讨的经济安全,就性质而言亦可归于上述范畴。不过,本文关注的对象并非经济安全本身,而更多在于经济安全观。具体言之,我们试图提出如下核心问题:加入 WTO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安全观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或演进?其背后体现着怎样的驱动因素和演变逻辑?对于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中国经济安全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关讨论也可谓方兴未艾。从既有成果观之,多数学者集中考察的是终端或接近终端意义上的问题,如中国经济安全所处的具体状态、维护经济安全所需的资源或能力、政策层面的适当应对措施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或现实意义。但不论是经济安全的状态或能力还是政策或制度,其实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一国对于经济安全的认知、理解和判断,也就是“经济安全观”。而恰恰是观念层面的经济安全问题,迄今似乎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与论及,因而成为理论阐释链条上相对薄弱的一环。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批准号:20&ZD062)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沈玉良研究员、黄超副研究员、苏宁副研究员和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和评论。至于文中一切可能的错误,均由笔者承担。

①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国家,但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一大国身份更多体现在政治意义上。如果以经济体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21 世纪初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与其实际潜力之间尚有距离。

基于这一缘故,本文拟考察加入WTO 20年中国经济安全观的演进脉络。文章结构如下:第一节讨论核心概念与分析起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中国经济安全观演进逻辑的基本判断。凭借这一判断,我们将加入WTO至今的中国经济安全观大致划分为适应期、调整期与确立期。第二节至第四节分别考察相应各分期,具体包括其阶段性特征以及决定这些特征的基本因素。

一、经济安全观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所言的“经济安全”指的是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自主性。关于自主性的内涵,我们沿用本杰明·科恩的观点,即自行作出决策、不受外在压力影响^①。有必要补充的是,我们对经济安全的界定,既涉及“状态”,亦涉及“能力”^②。与之相应,“经济安全观”是一国对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其中,“外部世界”指的是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体系内的关键行为体,如主导国家;而“基本看法”指的是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认知、理解与判断,如外部世界在哪些层面提供了助益或构成了威胁,其程度与性质如何,本国应当如何作出回应,等等。

鉴于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安全观,上述界定与官方正式场合的定义保持基本一致,即属题中应有之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③。就此观之,前述界定当可成立。此外,从既有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外部冲击之上,而不是国内经济事务或与外部世界关涉较少的领域。学界言及中国经济安全时,多数语境指涉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国内与国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张幼文等认为,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必须关注国民经济能否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国家经济命脉是否被外资控制等问题^④。顾海兵和张一弓则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主要关注外来挑战、对抗和不确定性”,其要义在于培育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使本国经济发展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仍然能够保持稳定与可持续性^⑤。本文所持立场,与此类观点基本一致。

中国经济安全观的演变既有历史性,也有规律性。就前者而言,经济安全观总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历史性。就后者而言,尽管经济安全观因时因地而异,但其中自有脉络可循,从而具备了规律性的内涵。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是由国情与历史决定的”^⑥。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从本文的界定来衡量,应可视为一国经济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即使同一个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环境及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以承认经济安全观的历史性与规律性为出发点,通过对中国加入WTO 20年的概略考察,本文认为: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安全观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1~2010年的适应期、2010~2020年的调整期和2020年之后的确立期。在每一个分期,中国的经济安全观都表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而决定这些特征的因素虽然为数众多,但最关键者基本可以归属于两方面。其一是中国自身在相应时段的发展目标和国家能力;其二是外部世界对此构成的助力与制约,其中尤以国际体系内主导国的态度和举措为主要。

^① 科恩指出,“如果一国能够自主行使政策——在政策形成与实施方面不受外在压力影响,根据自身意志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拥有权力”;“在这一意义上,权力并不意味着影响他者,而在于不允许他者影响自身”。他将权力的这一层含义归纳为“自主性”。Benjamin J. Cohen.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Power*. in David M. Andrews,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32.

^②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界定的“状态论”和“状态与能力并重论”,参见:舒展,刘墨渊. 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自主性. *当代经济研究*, 2014(10): 29-30.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人民日报*, 2015-12-24.

^④ 张幼文等.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性质与研究要点. *世界经济研究*, 1999(3): 6.

^⑤ 顾海兵,张一弓. 后30年: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战略的总体研究. *经济学动态*, 2010(1): 12.

^⑥ 张一弓,高昊,崔俊富. 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内涵. *财经问题研究*, 2010(3): 11.

二、2001~2010年的适应期

加入WTO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可谓中国立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尝试在制度层面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熟悉和适应阶段。以2001年加入WTO、2010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改革为前后边界,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从而呈现出若干阶段性的特征。

1. 阶段性特征

这些特征至少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是对于外部世界与中国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总体认知和定性判断。这一时期,中国表现出相对审慎而总体乐观的态度。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①。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要“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②。从相关表述来看,中国决策层倾向于将经济全球化视为不容回避的时代潮流,并且认为其中蕴含着可资利用的重要机遇。尽管中国也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影响^③,但并未因此趋于闭关自守,而是决意在开放中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维护自身安全。换言之,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都是既定的、不可动摇的决策,而将两者统合于一处的,则是对本国能够妥善处理相关问题的信心。这一态度在十七大报告中得以延续^④,从而贯穿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第二是对于本国经济安全在哪些重要环节或领域相对脆弱且易于受到外部冲击的认知和判断。从彼时出台的纲领性文件、法规政策以及学界相关研究来看,加入WTO第一个十年间,决策者在维护产业安全、引导外资发挥积极作用、防范不利影响等方面,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重视程度。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资领域的同时,要“吸引外资加快向有条件的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⑤。同年,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并于2006年形成《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⑥。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进行国家安全审查^⑦。凡此种种,均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对关键产业部门安全性的关切。与之相比,学界表达的忧虑和呼吁更为直接。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控制了部分产业,加剧了金融风险、资源风险、技术依附和人才流失,显著影响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⑧。还有学者则注意到制造业被纳入国际分工所导致的问题,如产业发展主导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等,并且明确提出应完善开放政策,推进国内企业技术升级^⑨。

第三是对于以何种方式保障本国经济安全的认识和判断,如制定怎样的方案、遵循何种进路、执行哪些政策等。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已开启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就化解外部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而言,更多则表现为一种“内向型”的应对方式,即主要依托于国内层面,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

①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求是 2002(22):11.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03-10-22.

③ 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参见: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求是 2002(22):11.

④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亦提及“注意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参见: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07-10-25.

⑤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03-10-22.

⑥ 汤欣. 经济安全与外资并购审查. 当代法学 2008(1):109.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新法规月刊 2007(3):31.

⑧ 魏浩,马野青.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5(3):70.

⑨ 王燕梅. 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工业经济 2004(12):42+45.

策手段来调和、缓解对外开放给国内社会经济运行带来的矛盾和张力。这一应对方式较少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触动或要求,而更多关注改变自身以适应新形势。换言之,其基本立足点并非改造世界,而是改变自身。从一些重要文件的表述中也可看出相关倾向,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①。可以说,加入WTO十年间,中国高度重视国际经济体系与本国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但主要关注点在于前者对本国的影响,而不在于本国对前者的改造。在同外部世界互动时,与更新、改革既有国际规则相比,熟悉和适应国际经贸规则显然居于更为优先的序列。

这一内向型应对方式,体现在国家基本经济体制、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具体政策措施等不同层次之上。

首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被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属性。这也在事实和法理层面构成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支撑。十六大报告提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③,其指向性可谓确切无疑。

其次,相关领域法律法规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屏障。实际上,这也可视作对国内相关呼吁的回应。加入WTO之前就有学者指出,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如果希望更好地规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加快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等法律的立法工作势在必行^④。加入WTO后出台的《反垄断法》及相关部委发布的规定等均包含着旨在防范经济风险、巩固经济安全的内容。以2006年《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为例,有学者认为,与2003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相比,新修订对外资企业境内并购范围进行了更严格的约束,强化了审批环节和反垄断审查,并且赋予商务部以经济安全审查的广泛权力;至于某些关键概念的刻意模糊,则意在促成“国家安全”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微妙平衡^⑤。

最后,相关政策手段成为保障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加入WTO之后,中国取消了许多此前曾经采用的产业政策,但并未放弃对政策空间的寻求和运用,而是将支持本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手段从原先的显性产业政策转向人民币币值低估^⑥。中国“不愿意让国际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它的工业的命运”,“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来对它的工业进行实质性的补贴”^⑦。

2. 因素分析

上述特征应当如何理解?或者说,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乃至塑造了加入WTO十年间中国对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经济安全之间关联的看法?约略言之,在诸多因素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其一与中国自身有关,其二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国有关。

第一,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国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安全观的基本倾向和内涵。

从发展理念来看,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⑧。在其指引下,集中力量推进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而经济全球化被视为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机遇。王正毅指出,在开放时代,中国实现发展的资源结构转向国内与国际资源并重,全球化成为重要的国际资源,“资源的两重化以及获取资源渠道的多样化”,使中国因全球化而受益匪浅^⑨。鲁楠等指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随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03-10-22.

②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求是 2002(22):10.

③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03-10-22.

④ 李海舰. 十五时期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思路 and 对策. 中国工业经济 2001(1):18.

⑤ 汤欣. 经济安全与外资并购审查. 当代法学 2008(1):109-110.

⑥ Dani Rodrik.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91.

⑦ 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 全球化的悖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28.

⑧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求是 2002(22):8-9.

⑨ 王正毅. 经济安全与中国发展. 国际展望 2006(4):32.

着谈判的深入,“经济考量占据了上风,而‘经济入世’便在观念和行动上都压倒了‘政治入世’的定位”^①。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全球化蕴含重大机遇的判断,推动形成了该时期总体乐观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前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表示,当时加入WTO之所以如此紧迫,原因之一一是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需要,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最大的进口市场,中国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与之打交道^②。中国加入WTO时所作出的承诺,甚至有部分内容超过了一般成员的义务^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其决心和信心。

从国家能力来看,在经济力量、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此时中国与排名前列的发达国家之间尚有明显差距。2001年加入WTO之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额的3.94%,仅为美国的12.57%,约八分之一^④。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中国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诸多制度、规则、惯例等缺乏充分深入了解。以WTO为例,中国在该组织的表现被概括为“四L”原则^⑤。鲁楠和高鸿钧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缺乏经验,不熟悉规则,缺乏整体战略,也缺乏专业人才、谈判能力和参与争端解决的能力^⑥。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意味着中国缺乏足够资源对国际经济体系及其核心规则架构产生实质性影响,难以触动世界经济运行的关键层面或环节、为自身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而只能凭借既有条件,专注于经济建设、积累自身实力,以适应性参与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展开互动。基于同样的原因,当国内社会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或扰动时,应对方案的着眼点往往是在国内层面,如借助相关法规、政策措施等,尽可能地将问题及其影响化解于边界之内。

第二,这一时期外部世界,尤其是主导国的经济理念及其经济实力的运用方式,构成了中国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安全观。

从理念层面来看,美国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认可与重视构成了其对华经济政策的底色。美国所持的是一种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开放式的经济安全观^⑦。其经济安全目标包括维护和拓展自由市场,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等;历年《国家安全报告》的内容也表明了其对推广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重视^⑧。由于美国将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投资视为最有利于发挥影响力并在与别国交往中维系乃至扩大本国优势的机制途径,那些倾向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更易于获得美国国内市场的准入机会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接纳。

从力量的运用来看,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把持是美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始终关注的焦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无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拓展国际市场,还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都需要以其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WTO、IMF、世界银行)的主导地位作为必要前提或基础。换言之,国际经贸往来与合作的基石是相关国际规则、规范,而这些规则与规范具有鲜明的美国印记,体现着美国偏好与倾向的深刻影响。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金字塔”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便告形成,在利益上浮、风险下沉的整体背景下,少数发达国家以俱乐部的方式协调重大国际经济议题,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则少有参与机会和实质性的影响力^⑨。

对照中美这一时期在理念、力量方面分别关注的重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本文主题。

① 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4.

② 孙振宇.中国入世十年得失盘点.国际经济评论2011(5):22.

③ 孙振宇.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11(4):114-115.

④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⑤ 即Less——承诺开放的范围少一点,Lower——减让幅度低一点,Longer——义务的实施期长一点,Later——推迟两三年再开始实施承诺的义务。参见:吕晓杰等编.入世十年,法治中国: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访谈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2.转引自: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6.

⑥ 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6.

⑦ 刘君,雷家骥,曹宁,戴智慧,李晓峰.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科研管理2001(1):16.

⑧ 顾海兵,李彬.美国经济安全战略及对中国的借鉴.学术界2010(3):62.

⑨ 江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求是2007(6):61.

首先,就两国各自的经济安全理念而言,虽然内涵各有不同,但至少在形式和举措上存在颇多相向、一致或契合之处,这也是加入 WTO 最初十年间中国对外部环境持总体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更具体地说,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内涵、外延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将中国加入 WTO 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影响力进一步扩展的例证,也不妨碍中国将经济全球化视为推动本国发展的重要机遇。双方在认知层面一定程度的契合,促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对稳定的互动状态。罗斯玛丽·富特和艾米·金认为,直至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以前,美国都倾向于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更多的经济相互依赖”^①。秦亚青总结道,美国对华战略的原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中国秉持和平合作的战略思想。尽管双方时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②。

其次,就经济力量的运用来看,两国分别表现出以外向或内向为主的行为模式。这一不同当然来源于双方在硬、软实力上的差距,但也在多数场景下促成了各持一端、彼此相安的态势。加入 WTO 十周年之际,时任 WTO 总干事拉米公开表示中国加入 WTO 后履行了相关承诺,遵守了 WTO 规则,对中国的表现给出了 A+ 的高度评价^③。中国对国际规则体系更多采取了适应性参与的态度,其行为以履约、守约为基本取向,而不以大幅修改甚至倾覆既有规则体系为诉求。

三、2010 ~ 2020 年的调整期

加入 WTO 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在前一阶段对外开放成就的基础上,试图推动本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朝着更具平衡与韧性方向发展的调整阶段。将此时段界定为 2010 ~ 2020 年的依据,主要是中国经济安全观在此期间展现的特征及其决定因素具有共性和规律性。从这一视角来看,若干重要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愈发得以凸显。以 2010 年布雷顿森林机构投票权改革、2020 年“十四五”规划出台为前后边界,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观出现了意义深远的调整,表现出某些重要的阶段性特征。

1. 阶段性特征

与前一阶段类似,这些特征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外部世界与本国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总体认知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仍然持乐观态度,但较此前更多地表现出对外部环境之不稳定、不确定性的关注与提防,表现出影响外部世界的意愿和信心。十八大报告认为,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提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包括“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等^④。十九大报告则认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⑤。总的来说,虽然意识到世界处于变革期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扰动甚至冲击,但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综合国力与发展道路的信心,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此阶段明显提升^⑥。

第二,就本国经济安全在哪些方面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或者更应当予以关注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视、迫切希望加以解决的,可能是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潜在风险点过于集中的问题。

^① 罗斯玛丽·富特,艾米·金. 评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政府对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 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下).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37.

^② 秦亚青. 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5):62+63.

^③ 崔鑫生. “入世”20 年: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回顾与展望. 人民论坛,2021(20):107.

^④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2007-10-25.

^⑤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2017-10-28.

^⑥ 如十八大报告所言“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十九大报告则指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参见: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2007-10-2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2017-10-28.

“十二五规划”要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①。2012年提出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②。2015年又提出“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且再次重申“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彼时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明显具有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特征。非对称性既体现在外贸依存度的长期高企,也体现在本国经济对发达国家市场、资本与技术等资源的倚重甚至依赖。实际上,“多元平衡、安全高效”所针对的正是过度集中的失衡状态,以及自主发展能力欠缺、经济发展与合作效益相对低下的问题。

第三,就如何有效保障本国经济安全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在应对方式上表现出注重战略性、注重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注重区域合作的特征。与前一阶段相比,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而不再局限于“适应性参与”的行为模式。换言之,中国在深化改革、调整自身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相应策略来影响外部世界,推动国际规则架构的更新和改进,促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发展环境。

首先是战略性的凸显。在涉及经济安全的考量中,战略性目标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例如,中国于2013年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④。其次,周边与发展中国家倍受重视。特别是“一带一路”实际上被赋予了拓展发展合作空间、提升发展韧性与可持续性的重大使命。中国于2012年提出“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⑤,次年又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⑥。2017年进一步明确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⑦。最后,区域及次区域合作受到更多关注。十八大报告提出“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⑧。从相关进程来看,21世纪10年代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已生效,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挥区域经济整合、协调作用,“积极参与东盟东部经济增长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稳步推动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区建设和泛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有序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⑨。

2. 因素分析

影响和决定上述特征的主要因素仍然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审视,即中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能力,以及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家的相关立场和行为。

第一,自2010年开始的这一阶段,无论发展理念还是国家能力,都展现出意义重大的更新或进展,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安全观演变最为关键的内部因素。

从发展理念来看,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内容与此前一脉相承,并无改变。但就如何实现相关目标,尤其是应当促成何等性质的国际经济关联以利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则形成了与此前颇有不同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着眼于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脆弱性过高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人民日报. 2011-3-17.

②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07-10-25.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人民日报. 2015-9-18.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13-11-16.

⑤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2-11-18.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13-11-16.

⑦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10-28.

⑧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2-11-18.

⑨ 刘友法. 未来10年中国周边经济安全形势及对策思考. 国际问题研究. 2012(4): 81.

等问题,通过推动国际经济规则体系“改制”与“创制”并举,力图调整和改变既有规则架构中不尽合理的内容,突破其对本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约束和局限。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及“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诸多举措^①,其用意均与此有关。

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理念无疑包含着调整自身、影响世界的取向。具体而言,即摆脱在关键规则、技术、资源、市场等方面被动接受既有条件的局面,走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受制于人的困境,尽可能把握发展与合作的主动权。如果说2010年之前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仍以适应性参与为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小国”特征,那么此后则明显呈现出迈向“大国”身份的意愿和动力。其中的关键原因是:此前开放进程所积累的失衡与脆弱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后发国家借力国际经济体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演变,若想化解愈发严重的失衡与脆弱性,拓宽渐趋狭窄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转变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转向更加重视内外平衡和相互促进,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转向更重视周边与发展中国家,从过度依赖技术模仿转向更重视自主创新等^②。总之,这一系列调整与转变旨在逐步解决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与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

从国家能力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取得长足进展,明显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从十年前的世界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③。到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④。与此同时,与外部世界的长期互动使得中国在化解冲击、解决问题等方面汲取了丰富经验。融入世界经济的相关经验和成就,无疑是中国展现出更为自信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中国运用国家能力、推动国际经济规则架构更新的举措,仍然面临许多因素的制约或阻碍。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赋予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自身与发展中世界争取更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合作空间的可能。但这一可能性的实现,由于其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固有利益结构的触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对后者的牵制和掣肘。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投行等新机制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阻力均与此有关。另外,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能力在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之时,还必须设法解决其间的通约性和折损问题。其中,前者主要指的是规模、体量意义上的实力如何能够投射至具体议题领域并发挥作用;后者指的是在运用力量,尤其是跨议题等界限投送力量时,如何确保不致于出现力量的过度折扣或损耗。

第二,主导国这一时期对华态度及行为的转变,是影响中国经济安全观出现调整的最重要外部因素。

从态度层面来说,最具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前一阶段对中国发展基本持“默许”甚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逐渐转向提防甚至压制。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如今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在于军事方面,而是在经济力量日渐显要的背景下提升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⑤。2013年,克里在国务卿提

^①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2-11-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10-28.

^② 孙伊然. 中国式开放: 应对全球化三难困境.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0): 10.

^③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2-11-18.

^④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 2017-10-28.

^⑤ Hillary Rodham Clinto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York City, October 14, 2011.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552.htm>.

名听证会上宣称:外交政策的本质就是经济政策,对资源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已遍及世界,如果不能展现领导决心,美国就会因此而遭到削弱^①。在这些表态背后有着共同的担忧对象,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美国人对经济领导权的可能易位深感忧虑”^②。实际上,早在 21 世纪 10 年代初联合国的报告就指出,发展中亚洲的迅速增长正在改变全球经济力量的均势,且这一势头极可能得以持续^③。以此为背景,中国作为可能取代美国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新兴大国,自然成为后者密切关注的对象。

随着主导国涉华认知与判断的更迭,竞争性的零和思维在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所占分量日益加重。有学者在考察美国关于中美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时,发现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之前的对华政策是以如下观点为基础:美国能够在军事和经济上维持显著优势,美国各界能够更普遍地受益于对华贸易,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引导中国实现自由化、化解其对美国领导权或国际秩序的挑战。然而 21 世纪 10 年代中期之后,这些观点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用她们的表述来说,“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中经济-安全关联的思考发生了质变”^④。

从行为层面来说,与态度转变相应,这一时期美国涉华决策中提防、针对、压制的成分明显增多。21 世纪 10 年代初即有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美国^⑤。后续事态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该判断。以中国在 IMF 的投票权为例,尽管改革方案于 2010 年就已获得 IMF 执行董事会通过^⑥,但在美国的阻挠下,迟至 2016 年才正式生效^⑦。2012 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是扼住中国进出口的海上通道,“对从波斯湾、非洲、欧洲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形成了空前的威胁”。美国一度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其中也含有将中国排除在外、削弱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迫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缘化等意图^⑧。2017 年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单边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加以制裁,挑起贸易冲突,更是美国试图以经济手段向中国施压的直接体现。

四、2020 年之后的确立期

2020 年之后,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安全观基本形成。经过此前的适应、调整阶段,中国确立了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总体思路。这一时期尚在进行之中。将 2020 年作为起始点的依据,一方面是中国此时提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战略性和指向性,另一方面则是其中诸多内容与经济安全观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为标志,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安全观彰显出强烈的大国意识、应变意识、系统意识,其对本国及世界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渐显现。

1. 阶段性特征

新时期的经济安全观已表现出若干特征。

第一,应变意识成为中国在考虑、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核心关切。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

^① Senator John Kerry's Opening Statement at Nomination Hearing to be U. S.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4, 2013.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senator-john-kerrys-opening-statement-at-nomination-hearing-to-be-us-secretary-of-state> .

^②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80-81.

^③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10: Retooling Global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p: v.

^④ 罗斯玛丽·富特,艾米·金. 评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政府对经济-安全关联的看法. 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下)》.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37.

^⑤ 庞中英. 论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兼论我国面对的深层经济安全挑战.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2): 140.

^⑥ 这一改革将使中国的投票权超过德国、法国、英国,位列美国与日本之后。参见:蒋旭峰,刘丽娜. IMF 总裁:中国投票权将升至第三. 新华每日电讯, 2010-11-7.

^⑦ 刘洪. 美国阻挠 IMF 改革凸显霸权思维. 经济参考报, 2015-10-15. 林建海,刘菲.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国际经济话语权. 经济参考报, 2016-4-29.

^⑧ 叶卫平. 论“一带一路”构想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安全的意义. 青海社会科学, 2015(6): 9+10.

是时局背景的变迁。“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中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随即指出“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以“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一判断为背景,新时期的中国决意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多年间始终重视安全问题,但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明确无疑地展现了安全在国家决策与行动之中分量的进一步加重。如高培勇所言,“构建新发展格局集中凸显和强调的是‘安全’二字”。新格局的提出与中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直接相关,可以说它是外部环境由量变演化为质变的产物^②。

需要强调的是,应变意识的彰显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安全观的长期特征。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③。从问题性质来看,百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关系到世界秩序及其走向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关系到中国置身其间所承受的影响。哈斯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失序”时代,“21世纪将极难管理和控制”^④。章百家则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敏感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国家安全面临的环境会更加复杂”,这一情况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⑤。问题的长期性决定了应对思路的长期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也有助于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何以成为“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和“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⑥。

第二,对风险来源的辨识和判定是新时期经济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已经意识到,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⑦。对于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20年代之后,最需要防范的外部经济风险依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力量冲击下遭到削弱和动摇;其二是全球经济事务的某些关键领域出现去中国化的倾向,如在国际经济规则的磋商与制定、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入、新技术标准的形成等方面。其中,前一类风险即时殷弘所言——由于全球政治文化急剧变更所导致的全球秩序动荡的危险^⑧。后一类风险主要来源于美国对华态度与措施。“十四五规划”在述及国际形势时指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其中相当一部分含义即在于此^⑨。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3~5年间,经济风险如资产泡沫、大宗商品冲击、债务危机等将十分突出,其次是地缘政治风险,如国家间关系和冲突等;未来5~10年间,最需要警惕的是环境风险、技术的负面影响、国家或多边机制的崩溃等^⑩。考虑到这些因素及其可能引发的连带影响,中国对前述两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冲击力度均不宜低估。

第三,新时期中国应对与化解外部经济风险的方式,较此前更鲜明地表现出以立足国内为力量源泉、积极主动的特征。换言之,以立足国内为首要前提和基础,新时期的“应变”不是被动消极、仅仅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而是从战略视角出发,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从根本意义上改善外部环境为指引。这一应对方式的本质是根据与其他国家经济关联的性质,如互补性、理念契合度等,通过多边、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人民日报, 2021-3-13.

②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 经济研究, 2021(3):6.

③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 人民日报, 2020-7-31.

④ 理查德·哈斯著. 失序时代. 黄锦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XII + XI.

⑤ 章百家. 中国正面对新挑战——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 国际经济评论, 2016(4):39.

⑥ 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人民日报, 2020-11-25.

⑦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 人民日报, 2020-11-4.

⑧ 时殷弘. 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6):28-30.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人民日报, 2021-3-13.

⑩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1.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 7.

域次区域、双边等途径,加强和深化彼此之间经济纽带,由此促成强韧、可持续、能够为各国内部社会群体所接受的经济相互依存。面对逆全球化、脱钩等风险,中国试图推动形成更具平衡与共赢性质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以此替换那些严重失衡且已成为风险根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为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奠定更为坚固的运作基础。如果将全球化进程视为覆盖众多经济体的关系网络,那么近年来该网络在若干部分的密实度已远不如前,甚至有濒临破裂的危险。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倡议如能妥善推进,即相当于对全球经济网络再行加固和补充。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诸多相关国家可望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立足点也将更为稳固。这也意味着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以及去中国化等问题的消弭和化解。

2. 因素分析

理解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安全观,以两方面因素最为主要。其一涉及中国的发展理念与国家能力,其二涉及外部世界的立场及行为。

第一,经历多年演进之后形成的发展理念和国家能力,是推动大国经济安全观得以确立的直接内因。

从发展目标来看,新时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决心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迈上新的台阶。这一远景目标的实现,是以“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前提的^①。新发展格局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为要务,立足于国内,即“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②。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对经济事务的处理将依循一条基本思路,即以大国身份应对全球变局,在应变中以大国担当为自身和世界创造发展机遇,在共享发展机遇中巩固强化大国地位。

从国家能力来看,新时期中国已基本具备了依照上述路径为自身及世界谋发展谋安全的条件。作为正在崛起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较以往大有增长^③。在全球市场体系内,中国拥有较之于其他许多国家更为坚实、牢靠的国内立足点。这种依托同时也赋予了其发挥影响力、维护国际经济合作趋稳向好的手段和空间。消费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为扩大内循环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根据中国工程院发布的数据,在26种主要产业类型中,中国超过60%的产业处于“安全可控”等状态,抗外部风险能力较高^④。近年来,“欧盟及亚太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增加,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流动”,成为区域化贸易增长的首要驱动力^⑤。这一动向可谓中国经济辐射力提升的表现。江小涓和孟丽君指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排名第一,已居于重要位势。鉴于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既长且广,许多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因此为自身发展计,亦有必要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并维护其安全^⑥。

第二,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尤其是涉华立场与措施,构成了影响新时期中国经济安全观的外因。

从态度层面看,总体而言,美国所抱持的竞争性立场最为明显且具有长期性;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相似,但程度次之;其他国家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则较为和缓,对拓展经贸合作、提升双边关系持开放甚至积极态度。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人民日报, 2021-3-13.

②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 人民日报, 2020-11-4.

③ 章百家. 中国正面对新挑战——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 国际经济评论, 2016(4): 40.

④ 曹远征. 以双循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文化纵横, 2021(3): 85-86+89.

⑤ 余淼杰, 蒋海威. RCEP助力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江海学刊, 2021(3): 85.

⑥ 江小涓, 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管理世界, 2021(1): 14-15.

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①。受此影响,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时有显现甚至增多^②。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先后签署一系列高标准自贸协定,如果全部生效,这些协定将覆盖 55% 以上的国际贸易和投资^③。美国的意图是迫使其他 WTO 成员接受美国主导的新规则,消解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影响力^④。章百家认为,中美之间的博弈很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双方尚不确定彼此力量的限度^⑤。同时,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意愿趋于弱化,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开放意愿并无减退,甚至有所提升,它们已成为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并且更倾向于采取“基于自愿原则的低制度化方式”^⑥。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更有可能视中国为发展机遇所在,进而参与到后者提倡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发展合作框架之中。

从行为层面来看,美国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对华竞争的基本态势仍将持续。秦亚青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施压的力度并无减弱。美国对华战略行为的变化根源在于其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即更多地从竞争角度考量双边关系。这种以竞争为主的竞合关系将表现为相对持久的战略博弈^⑦。至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贸易争端与产业政策、高技术脱钩、产业链重组等涉华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基本相同或接近,即“与中国对立或竞斗”,但程度略缓^⑧。

相比之下,周边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诸国,在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方面更为积极。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 140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⑨。以东亚生产网络内部循环趋于强化为背景,2020 年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⑩。2021 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东盟在内,众多发展中国家深化与华经济合作的意愿及行为,是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

(责任编辑:张 薇)

① Donald J.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p. 25.

② 魏南枝. 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现代国际关系, 2016(11): 51.

③ 江小涓, 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管理世界, 2021(1): 17.

④ 屠新泉. “入世”15 年: 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国际商务研究, 2016(6): 36-37.

⑤ 章百家. 从党史和外交史看国际问题的处理. 俄罗斯研究, 2021(3): 25.

⑥ 郑宇. 21 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8): 135 + 141 + 150.

⑦ 秦亚青. 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15): 62 + 64 + 66.

⑧ 时殷弘. 世界格局: 彼此歧异的短中期状态与长期趋势. 俄罗斯研究, 2021(5): 9.

⑨ 国家发改委开放司. 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改革报, 2021-2-8.

⑩ 王一鸣.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现代国际关系, 2021(1): 7.

Contents & Abstracts

Do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Real Economy?

Ba Shusong Chai Hongrui Fang Yunlong Wang Bo(3)

How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operation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the highland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FTZs provide a natural test ground for China to deepen the 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effects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financial reform in FTZ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real econom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 firstly , the financial reform of China's free trade zone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 but also has a "time expansion effect" , that is ,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time of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reform measures ,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Secondly ,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 financial opening effe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financial reform of the free trade zone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the real economy. Lastly ,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s free trade zone has obvious location heterogeneity , and the differenc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heterogeneity of policy effec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not only expands the research dimens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free trade zone , but also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nancial reform of the free trade zone for deepening the 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real economy.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form and the Proposition to China

Zhang Lei Lu Yicong(22)

The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once again shows a positive signal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Recently , many WTO member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WTO reform plans. On this basis , it is found that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falls on the authority , effectiveness , relevance and inclusiveness of WTO reform. Chinese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necessary reform of WTO to resolve its existing crisis. In this round of WTO reform , China should adhere to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 safeguard investment and trade fairness and promote negotiations on e-commerce , fishery subsidies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 which will enhance the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WTO , and increase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WTO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omparison of CPTPP and RCEP Service Trade Rules and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Strategy

Quan Yi(30)

CPTPP and RCEP are the two maj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as many as seven overlapping members , which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rules of trade in services ,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CPTPP for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 it puts toward the negotiation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 ,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s View of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Past 20 Years after Its Entry into WTO

Sun Yiran He Yao Li Bing(42)

Economic security refers to the autonomy of a country in economic affairs. The view of economic security refers to a country's

basic cognition ,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world and its own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past 20 years since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view on economic securit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adaptation period , the adjustment period , and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During the adaptation period from 2001 to 2010 , China intended to integrate into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and its way of ensuring security lied more in changing itself , and less in changing or requesting the outside world. During the adjustment period from 2010 to 2020 , China focused on issues such as high external dependence and vulnerability , and showed more willingness and confidence to influence the outside world , aiming to resolve the mismatch between its status and strength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fter 2020 , a major power's view of economic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ically takes shape. China's approach to resolve external risks has more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 pro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aking a foothold at home as a source of strength. This approach is not only oriented towards solving specific problems , but also based on strategic thinking , guid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general , the view of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major power , contingency awareness , and systemic awareness , and its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is gradually show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Returning to Protectionism Via Trade Credit in Supply Chains: Evidence From Firms Attending USTR Hearing

Chen Sichong Guo Yehua Zhang Lan Reng Yuejing(54)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held a hearing on whether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are subject to Section 301 tariffs on August 20 2018. This work sorts out the attitudes of firms attending the hearing as a measure of the corresponding industries' dependence on the China-US supply chain. Firms tend to oppose the 301 investigation and tariffs if they dependent more on China-US supply chains. Then , we assess the heterogeneous market responses caused by trade protectionism using the event study method. Finally , we employ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framework to examine whether firms highly affected by trade protectionism are more likely to transmit negative shocks to their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through supply chai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ms in industries depending more on China-US supply chains suffered mor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from trade protectionism. Moreover , Chinese listed firms which suffered more from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call for a reduce in the trade credits to downstream customers and an increase in the trade credits provided by their suppliers.

Determinants of Multinational Firms' Market Entry and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Xu Meina Xia Wenping(68)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as a new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 which is the carrier of digital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rovision , and the core of the digital ecosystem. Based on the parent-subsidiary level data of digital multinational firms from 2011 to 2020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ntry and expansion of other digital MNEs in the host countries (host)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in the host country(reg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 probability of new entry and expansion of other digital MNEs. However , the above-mentioned positive effect weakens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vestment by digital M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market in the host country (region) is a supplementary mechanism for investment attraction. Robustness checks such as IV estimation confirm the robustness of the above results.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ing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and subsequent digital firms in the host country (region) explains the above association. Heterogeneous analyses show that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from non-parent countrie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attracting subsequent digital MNEs than that from parent countries. The baseline result is also greater in host countries (regions) where the legal cost of enforcing contracts is lower , the communication cost is lower , and the market size is larger. The conclusions have rich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ent country , it provides micro-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existing platform-based works on Chinese digital firm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host countries (region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st country ,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platform-based digital firms and the developing of domestic digital market in promoting the investment inflow of digital firms in China.